

本书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社科基础学科平台（一期）课题资助

# 中国当代社会语言学研究

周晨萌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本书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社科基础学科平台（一期）课题资助

# 中国当代社会语言学研究

周晨萌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社会语言学研究 / 周晨萌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663-1986-9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中  
国—现代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892 号

© 2018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国当代社会语言学研究

周晨萌 著

责任编辑: 强晓洁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mailto:uibep@126.com)

---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9 印张 152 千字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663-1986-9

定价: 45.0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一、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	1
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	3
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流派 .....	6
四、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	8
五、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	13
第二章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	17
一、语言变异学派 .....	17
二、言语交际学派 .....	40
三、语言社会学 .....	51
第三章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 .....	55
一、研究流程 .....	55
二、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 .....	63
第四章 语言变异研究的新进展 .....	69
一、社会地理语言学 .....	69
二、语言扩散的新模型——Glottogram 和球形扩散模型 .....	89
三、研究案例 .....	92
第五章 话语分析研究的新进展 .....	95
一、当代中国话语分析研究现状 .....	95
二、当代话语分析的新流派 .....	100
第六章 社会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	105
一、商务汉语研究 .....	106
二、对外商务汉语教学研究 .....	119
第七章 余论 .....	125
参考文献 .....	127
后记 .....	135

## 图表目录

图 1-1	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框架	8
图 2-1	(th) 的阶层分化	19
图 2-2	(r) 的阶层分化	20
图 2-3	40—49 岁下中阶层带 (r) 音超越上中阶层的情况	21
图 2-4	18—39 岁不同阶层的人对 (r) 的主观评价	21
图 2-5	社会网络的两个层区	24
图 2-6	高密度的个人网络结构	24
图 2-7	低密度的个人网络结构	24
图 2-8	北部城市音链变化	28
图 2-9	男女 Burnouts, In-betweeners, Jocks 的参与分值	30
图 2-10	女生的社交网络图	31
图 2-11	地理空间的波浪模型	34
图 2-12	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波浪模型	36
图 2-13	词汇扩散的 S 形模式	38
图 2-14	不同人使用新语音形式的比例	39
图 2-15	CLA 模型	41
图 3-1	研究的完整程序	66
图 4-1	“地理语言学”的学术关注度	72
图 4-2	语言球形扩散模型	91
图 5-1	会话分析年发表量的变化趋势	96
图 5-2	话语分析年发表量的变化趋势	96
图 5-3	会话分析文献的发表期刊	97
图 5-4	话语分析文献的发表期刊	97
图 5-5	会话分析的作者发文量	98
图 5-6	话语分析的作者发文量	98
图 5-7	会话分析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99
图 5-8	话语分析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99

图 5-9	静态视觉图像的分析框架	102
图 6-1	专用语和普通语间的关系示意图	109
图 6-2	会议的基本会话结构	113
图 6-3	商务汉语学习动机分类	123
表 2-1	各阶层对 (r) 标准音和 (th) 标准音持肯定态度的 百分比 (%)	21
表 2-2	不同的阶层在不同语体中 (ng) 的计分	23
表 2-3	C 区 4 名 40—55 岁男子的网络强度值和语言变项值	26
表 2-4	每个变项极端变式的使用情况	29
表 2-5	性别与范畴制约的结合	30
表 2-6	各方言中的“见”组字的读音	35
表 2-7	词汇扩散的过程	37
表 2-8	偏泉腔央元音崩溃结构扩散时间历程表	39
表 3-1	确定概念的方式	57
表 3-2	分层抽样的示例	58
表 3-3	配对变语法的评价量表示例	61
表 3-4	质性、量化数据与分析	62
表 4-1	目前所见的相关术语	71
表 4-2	沿黄河流域“策、色、侧”三字读音的 Glottgram 分布表	92
表 6-1	专用语的纵向分层	110

# 第一章

---

## 绪 论

### 一、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我们常能听到这些句子：“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他语言流畅”“这个人语言污秽”“我们要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奋斗”等。“语言”这个词我们用得很频繁，我们日常生活中总要通过语言来进行会话、交际、沟通甚至思考。语言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然而，语言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乍听起来有点怪，然而它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们探讨了数千年的问题。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被称为“古老的柏拉图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在人们探究语言本质的过程中，我们已然可以发现当时朴素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早在 2000 多年前，古希腊人就对语言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人们认识到语言是普遍存在的，是为全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而同时认为，语言和种族、文化是有关的，不同种族的人可能会说不同的语言。例如，希腊语里就将说异族语言的人称为 Barbarian（现代英语中“野蛮人” barbarian 就源于此）；中国古代也有一种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的陋俗，蔑称南方人为“南蛮”，孟子竟也称出生于楚地操南方方言的许行为“南蛮舛舌之人”。可见，当时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语言的不同以及与文化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始关注语言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语言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公元前 315 年，由芝诺（Zeno）创立的斯多噶学派（The Stoics）提出，语言是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并为语言学在哲学的众多议题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还由此引发了西方语言哲学史上旷日持久的

“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从语言学方面看，实则就是语言任意性与象似性的争论。无独有偶，对于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荀子也有提及，他在其《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段话看似在阐述事物名称命名的一般规律，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语言的任意性与言语群体的联系、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索词语的社会意义。

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开始思考人类的起源问题，当学者们对比语言发现欧洲、亚洲很多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时，语言研究就立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期间有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他的著作《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中的长达300页的导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在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文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人类头脑中普遍存在着对语言的创造能力。<sup>①</sup>他认为，语言不仅与思想密不可分，还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是人类的原始形成中的第一个必要阶段，在此之后人类才开始追求其他更高级的发展方向。同时，人类思维的创造性表现为语言的创造性，儿童语言习得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语言能力的增长（这点后来被乔姆斯基继承发扬）。可以看到，洪堡特这里提及的两点：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sup>②</sup>，同社会语言学研究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也是此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兴起了英文拼写革命，欧洲其他很多国家兴起了方言研究之风。比如，对英文拼音、书写的规范化，英语方言词典的编纂，德国方言地图的绘制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详情将在第三章展开论述。

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为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与弗斯（Firth）为代表的伦敦功能学派和以博厄斯（Boas）与萨丕尔（Sapir）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

马林诺夫斯基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社会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不过，他对语境的论

---

① 18世纪人类学者们探讨人类起源时认为，人类高于动物之处在于语言，就引发了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探讨。

② 他的这一观点后来也影响了萨丕尔。



述,还只是一种探索。三十年后,语境理论在“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那里才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弗斯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首次以较完善的方式阐述了说话人、语言形式、语言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可惜的是,弗斯的语境学说在结构主义盛行时期没有得到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在社会语言学家的论述中找到某种关联与回归。需要指出的是,韩礼德(Halliday)后来继承和弘扬了弗斯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尤其在社会语境中语义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明确无误地声称“语言学系统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系统”。

而至于北美人类语言学传统对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可以说,北美早期的语言学研究多半同人类学、民族学有紧密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语言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时。博厄斯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强调不同人种、语言、文化的变体及其多样性,注重考察研究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联。博厄斯首创的美国人类语言学传统,通过萨丕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萨丕尔认为,语言不同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语言的变化保留、记载了语言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接触的过程,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学可以回答民族学的问题。可以看出,萨丕尔的理论充满了一种文化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的精神。受到萨丕尔语言文化观的启发,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北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传统,在海姆斯(Hymes)的言语交际民俗学理论和交际能力理论中得到弘扬,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 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随着语言学背景的逐步成熟,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Language第36—40卷(1960—1964)的索引中,已有“社会语言学”一词。到了196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英美一些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描述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理论范式,而应当关注社会语境中全面系统的语言研究,由此正式形成了一个同形式语言学研究传统相抗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及学术动机。最为显著的一

个特点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带有浓厚的批判性质，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反面而出现的。

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从结构角度来认识语言，始自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de.Saussure）。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体现了他的主要思想。虽然这本书中只出现了一次“结构”，而且此“结构”和后来结构主义的“结构”并不直接相关，但从结构角度认识语言，重视语言在结构上的系统性却开了一代学术研究的先河。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两大类，但他只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只关注“内部语言学”。索绪尔又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分，前者是指语言系统，是抽象的，后者是指个人的说话，是具体的，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语言却是同质的。他只关注同质的语言系统，追求整齐性、对称性和规律性，把语言与社会联系之类的因素全都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索绪尔还区分了共时和历时，他认为，语言是共时的，不是历时的。但他只研究语言结构僵化的死系统，却不能解释如何从一个共时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状态。美国描写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也说：“我们并不寻求一个语言形式在言语社团的各种场景的用处。”（L. Bloomfield, 1927）

实际上，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中运用的交际工具，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语言在社会协作中产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语言中充满着变异的形式，不同的人由于地域、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在语言使用上有不同差异，就是同一个人，其言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中也有不同。个人言语既有语言系统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同时又有个人特点。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研究越来越狭窄，遭到了众多语言学家的质疑。

社会语言学可以说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它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提倡语言异质说，主张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被运用的。拉波夫（Labov）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现实社会的语言学（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Labov, 1972）他研究语言，但更多的是联系语言及其使用者的社会背景：社团、阶层、地位、性别、年龄、人种、方言、地域、风格等来研究语言。社会语言学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r)音的社会分层、黑人

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除上述传统语言学自身存在局限,需要有新的学说弥补其不足的原因之外,社会语言学的产生还由下面所说的两方面的需要促成: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日趋复杂,需要找到恰当的途径予以解决;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浪潮,这股科学发展潮流也波及语言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相继问世。新学科的出现表明单凭传统语言学已经解释不了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语言现实,语言学者必须借助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更宽广的角度、用更新颖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去考察语言。社会语言学就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语言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交汇处形成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不断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拉波夫的成就获得了韩礼德的赞誉,称他揭露出前人没有看到的关于语言本质的事实,并且将这一主题的研究引领到新的富有成效的道路上。吕叔湘先生也给予社会语言学高度的评价,把它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列,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他说“直到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即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

至于什么是社会语言学?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目标广泛,至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英国的社会语言学家们作出自己的尝试,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语言的那部分语言学”,唐斯(William Downes)称“社会语言学是必须参照社会因素包括情景因素解释语言 and 具体语言的特性的那支语言学”,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则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各方面关系的语言学分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社会语言学”条目给社会语言学下的定义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sup>①</sup>

<sup>①</sup> 祝晓瑾.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7.

### 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流派

社会语言学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至今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依然众说纷纭，无一定论。针对这一问题，祝畹瑾在其《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2013）中有详细的论述，我们在此不做深入的讨论。同样，社会语言学至今也没有形成像其他学科一样的理论体系。这是由社会语言学的应用型、跨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它从理论的借鉴到方法的选用，都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大众传媒等学科的研究紧密关联，体现出研究范围宽泛性、多样性和驳杂性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社会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取向，并由此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流派，即语言变异学派、话语文化学派、语言社会学派，其领军人物分别是拉波夫、海姆斯、费什曼（Fishman）三位美国社会语言学学者。

语言变异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拉波夫，他曾明确表示，成功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必须以日常生活中使用着的语言作为经验研究的基础，而社会语言学就是这样一门“现实社会的语言学”。<sup>①</sup>因此，他更为关注人们使用着的语言形式的共时变异，以及变异背后的促成机制。语言变异理论的核心认为语言是一种有序异质的系统。语言中充斥着各种变异，杂乱无序，如不同人发 /a/ 绝不会完全相同，上海人说普通话不会完全和北京人一样。但如果有些变异形式和非语言的异质因素（如某一社会人群、某一风格变体）或同质的语言结构要素有固定的联系，即可以由一定的条件来控制，那么这些变异形式就摆脱了无序的状态而进入有序的行列，开始了它的演变过程。这些条件一般是由于变异形式的使用人群的社会地位而使得变异形式具有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从而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逐渐从一个群体扩散到整个社会。特鲁吉尔后来更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将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方言学的研究中去。可以看到，语言变异学派更关注语言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微观社会语言学，又称之为“社会语言学本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干。

海姆斯同样强调应结合社会文化和社会语境来研究语言。他认为，语言交际是人们的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语言是什么”的研究不能与

<sup>①</sup> William Labov.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1972: xiii - xviii.

研究“如何使用语言”以及“为什么使用语言”相脱离。但与拉波夫不同的是，他的关注点不是语言变项，而是言语交际行为。他力主从民族志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选择一个社群作为描写单位，观察说话者需要了解哪些文化和社会规则才能进行有效的交际，以及如何学习这些规则。也就是说，其关注的是人们怎样在社会文化规则支配下使用各种语言变体来实现交际意图、完成交际行为。海姆斯的研究更多的是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来进行分析，关注的是语言行为背后的文化规约。但可以看出，他已经具有了动态的研究理念，知道关注人们交际过程的形成，因此，他也称社会语言学为“社会形成的语言学”。<sup>①</sup>随着对言语交际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通过言语行为发现文化规约，而更多地转向对交际中使用的话语的分析，研究话语的结构、会话含义的构建、会话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同时，对社会因素的研究放在考察隐藏在语言使用不平等现象背后的权势、阶层等社会和政治含义上，尤其是在法庭、医院、学校这样一些涉及语言使用问题的公众生活领域。这两种研究虽然路径不同，但其研究主题都是言语交际，存在承接交叉的关系，我们统一称之为言语交际学派，也可以称之为中观社会语言学。<sup>②</sup>

费什曼在社会语言学学科确立之后没隔几年，就使用“语言社会学”这一名称来替代当初他同意采用的“社会语言学”名称。<sup>③</sup>他认为，语言和社会两者都十分复杂多变，语言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有着许多必然的联系，但是，美国的语言学者和社会学者对彼此的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和了解，几年来社会语言学研究偏重语言学方面，没有突出语言的社会学方面，他要努力促使研究者借用彼此的概念和方法，进而研究语言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变化进程。<sup>④</sup>他更是提出，应该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划分为宏观的和微观的两部分，微观部分他称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变异（如阶级、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而宏观部分他称为语言社会学，研究的是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规范、语言与民族等问题。“社会语言学事业”必须发展语言社会学，语言社会学关注的中心课题不仅限于语言使用本身，还包括社会对待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和行动。可以说，费什曼的研究是以社会本身作为研究起点，将语

① Dell Hymes.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1974: 92-209.

② 有人也把两者分开，称海姆斯的研究为言语交际学，称后者为话语分析，又衍生出不同的研究范式。

③ 需要说明的是，1972年费什曼开始使用“语言社会学”名称，但从未摒弃“社会语言学”名称；有学者把他50多年来的学术建树称为“费氏社会语言学”，以凸显语言社会学在社会语言学学科中的位置。详见：Ofelia Garcia, Rakhmiel Peltz and Harold Schiffman. *Language Loyal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2006: 8-10.

④ Joshua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1, 1971: 7-8.



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说明：

(1) 使用语言的人。又可以分为说者和听者，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各有各的社会特征，比如不同的性别、年龄、阶层、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此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同时又与跟他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人具有共同特征。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人”不是个体而是这样具有相同的特定社会特征的一群人。社会语言学者先后使用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也译作言语社群、言语社团、言语社区）、社会网络、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三个概念来指称这个群体。

拉波夫认为，任何一组可以用语言交流的人都可以构成一个语言社团，根据交流程度的不同，语言社团可以是多层次的，较小的语言社团嵌入在较大的语言社团之中。徐大明等认为，不能停留在“任何一组可以用语言交流的人”的抽象定义，应定义出具有“现实性”的语言社团，应以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为标准，如“家庭”“部落”“村庄”“城市”“地域性市场”“国家”“贸易区”等，如纽约市英语社团、东哈莱姆波多黎各人社团。

虽然徐大明等的论述使言语共同体的概念更为完善，但可以看到其所指没有绝对明确的界限，其边缘成员与核心成员的语言能力并不相等，每一个成员所使用的语体也并非始终如一。鉴于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顾及不到个体言谈特征，米尔罗伊（Milroy）又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即个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总合，它是基于个人的交际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划定的一个研究单位。实践共同体是埃克特（Eckert）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观察研究比网络结构更小的集体的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又一个概念。它是指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经常相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一伙人，这一伙人有相似的兴趣和生活圈子，参与类似的社会实践，言谈中自然也会出现相同的变异形式。在这一范畴内分析语言变异可以观察到语言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2) 使用的语言（文字）。如前所述，我们通常认为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所说的话实际上千差万别。变异性是语言的基本特质，语言总是充满了离散的、变异的形式。“语言”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语言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语言变体（Variety）”这个概念来进行称说。后来，为了避免被人们误解为某种标准语言的变种，因而很多学者又都把这个概念称为语言代码（简称“语码”）这个中立的名称。

赫德森（Hudson）认为语言变体是指“具有相同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形式”。

所谓社会分布是指一群接受和使用某一些语言形式的人，也就是说，语言变体就是指具有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社会环境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这个概念的外延可大可小，大可以指超语言的形式（其限制性特征就是具有相同社会分布，而有的国家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有人认为语言变体的范畴也可以超越一种语言），中可以指语言、方言或语体<sup>①</sup>，小可以指单个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而这些语言形式中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称为“变项”（variable），“变项”的不同变化称为“变式”（variant）。例如，拉波夫调查的/r/是“变项”，/r/卷舌、不卷舌是“变式”，又如广告中出现的歧视女性的词汇是“变项”，各种不同的歧视表现是“变式”。

（3）交际沟通。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在于交际、沟通，而人际交往又反作用于语言使用。一方面，人际交往维系着一种语言内部的一致性，当人际交往密度小时，语言内部的一致性就会降低，从而产生方言差异；反之，人际交往密度的增大也能够加强这种一致性，从而出现方言差异日益缩小、标准语逐渐普及、众多语言与方言消失或正在走向消失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人际交往还带来了不同语言变体间的接触，语言变体相互间的接触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例如语言干扰、语言借用、语码转换、语言混合以及语言转用。这是宏观层面对人际交往的关注。

对人际交往的微观研究，更多的是对言语交际和话语交际的关注，对前者的关注是民族志学者的任务，后者则是话语分析学派的研究内容。海姆斯指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人们进行言语交际仅靠“语言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得体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交际能力”。所谓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指说话者在交际情景中利用语言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可以细分为四个方面，即语法的正确性、语言的可行性、语言的得体性、语言的现实性。而交际情景又受到诸如交际时间、场合、对象、话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把交际事件（或称言语事件）作为言语交际的基本描写单位，通过观察特定群体的言语交际，了解社群的行为规范、文化习俗等。所谓交际事件是指发生在特定环境中的交际活动，如在教堂里做礼拜、在拍卖行里做交易、在教室里上课、在酒会上交谈等。

而话语分析学者则以话轮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所谓话轮，指的是说话者

<sup>①</sup> 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语言变体形式，方言（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



从开始说话到结束说话之间所说的话。话语分析学者着重分析话语的结构特征、话语的使用规则与内涵、言语交际中会话双方的互动，以及语言使用不平等现象背后的权势关系。对不同研究内容的关注也就形成了话语分析中的不同流派。

(4) 使用语言的环境。简称“语境”，有大语境和小语境之分。大语境指的是社会语境，即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社会语言学者确信，说话人使用某些语言变异形式与其社会背景有关，例如称呼语的使用、人名和地名的命名方式等，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社会烙印。不仅如此，社会语言学者们更提出了社会变项的概念，用来说明社会文化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他们认为研究语言变异模式首先必须断定哪个社会变项与某个语言变项相关，比如，说话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种族、家族背景、劳动分工和职业、性别、年龄等。

小语境指的是使用语言的具体情景，通常由说话人和听话人、场合、话题等因素构成。早期社会语言学者关注的是由于使用语言的情景类型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语体形式，一般来说，话题、场合越正式，语体就越正规；话题、场合越随便，语体就越随意。拉波夫最先关注语境对变异模式的影响，他区分了随意说话、留意说话、读短文、念词表四种语境，并据此来看不同语境中的语体形式的变异。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也指出，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的编码就是对语言项目或者说是意义项目作出选择，同时，意义成分的选择又受到三方面的制约：语场，指语言活动涉及的范围；语式，指语言活动的媒介；语旨，指语言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及发话人想要向听话人实施的意图。它们三个共同组成了语域，任何一项发生变化都会引起语域变化。“意义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sup>①</sup>，语域能决定语言环境和语言意义。

早期社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但在他们的研究范式中，语境是静止的，说话人只不过为了适应特定语境而使用某一语体，描述的是语境因素对语言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过，情境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例如，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地位高、辈分高、年纪大的人常用敬语。因此，学者们认为语体变化的深层原因在说话人，他们开始深入到微观视角进行探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贾尔士（Howard Giles）提出了“人际言语顺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简称 SAT），他认

①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9。